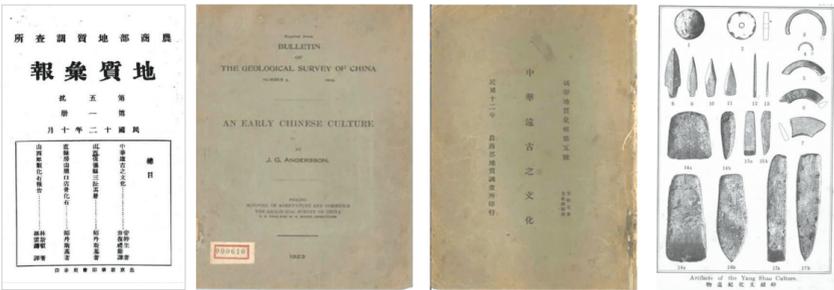


■经典重读

# 重读《中华远古之文化》

——中国考古学初创标志性发掘研究报告发表百年纪念

魏兴涛



## 仰韶村遗址发掘者与《中华远古之文化》作者

1921年,受聘于中国政府的瑞典学者安特生(J. G. Andersson, 1874—1960)带领其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5名中国助手刘长山、陈德广、白玉玉、姚某等和该所新聘技师袁复礼,以及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Zdansky)、加拿大解剖学家、人类学家步达生(D·Black),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10月27日开始,至12月1日,历时35天。

《中华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1923年10月在地质调查所主办的《地质汇报》第五号第一册上发表,报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还发行了摘印本。作者系安特生,杰出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914~1924年被聘为中国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野外调查工作依托于中国地质调查所,1920~1924年任地质矿产陈列馆(今中国地质博物馆前身)馆长。另著有《甘肃考古记》《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河南史前遗址》等。

袁复礼(1893—1987),河北徐水县人,为留美归国地质学者,后成为著名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他既是仰韶村遗址发掘的主要成员,承担地形调查、测绘遗址图、共同发掘、现场记录、英语翻译、协调处理发掘中遇到的纠纷等工作,又于1923年1月在首刊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是迄今所知关于仰韶村遗址发掘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简讯(即简报)。他用中文译《中华远古之文化》主要内容,实际上是该著作的第二作者。

## 《中华远古之文化》内容摘要

该著作由安特生撰写英文,主要内容经袁复礼中文翻译,分为英、中文两部分。英文部分原文共68页,另附图版17张。其中正文分六个章节,章节无标题,计42页。正文后为17张图版的文字说明,计26页。中文部分为翻译的正文及图版说明,对六个章节正文内容归纳命名了标题,正文27页,其后18页为文后图版的文字说明,共计45页。中文为繁体字竖排。是一部英文、中文或谓中英文双语的考古发掘研究报告。

袁复礼命名的六个章节主要内容如下(以下均引自重印版安特生著、袁复礼节译:《中华远古之文化》,文物出版社,2011年,中文为简体字横排):

“绪言”介绍,安特生“在中国北方诸省调查地质上之第三纪第四纪地层”,兼及“远古古迹之发掘”。关于对遗址调查采掘的方法,“如判别古代器物之新旧,文化发达之次第,为考古学之要事,皆不得不借助于地质学之测绘地形鉴定地层诸方法”。

“中国石器之源流”部分,考证中国古代表方刀、铤、戈三类器形的源流与发展。指出中国存在石器时代。

“古代文化之遗址”部分着重介绍仰韶村遗址发现发掘过程及获得的遗迹遗物信息。1921年“呈请中国政府准许复至渑池县仰韶村采掘,蒙农商总次长及地质调查所所长极力赞许,河南省省长官及渑池县知事亦均尽力襄助”。

对遗址范围、周边环境、地形地貌、水文等进行了考察。遗址及附近地形,经袁复礼详细测量,按1:4000比例、5米等高线绘制地图。采掘地点十七个。观察到“灰土层每做袋状”,经研究是“地下收藏器物”的窖穴。

描述所采器物特征。“石斧极多,……更有石凿,及如凿刀之石斧如近世之铤者”。“据石器之大者观之,如髑,如锄,可知在该石器时代亦已有农业矣。更有石或泥烧制之圆铤,作纺织上合线底垫之用,纺织材料出于植物,可知当时亦已有种植矣。又如陶器上之印文,有绳印或布印者,其绳印呈系芝麻所编之绳,亦可见其时已种芝麻”。另有石刀、杵、环、瓠、铍、缝贝骨针及骨锥、鹿角斧(应为锄)等。

指出陶器特征最显著,暂分二类,一为“粗陶器”,另一类较精致,多为彩陶。

“石器遗址之年代”部分,认为“最重要之问题乃其年代”。从“遗址全部而论,似当为新石器时代之末期”,“取本地之名而名之为仰韶文化时代”。

“仰韶文化与中国人种之关系”部分,判定为“远古之中华文化”。“自仰韶器物形状观之,则全似为汉族遗迹”。“尤堪注意者,为一种三足器,……鬲文……更显著为周鬲像形文字。”“以为仰韶文化之人种当为现代汉族之远祖,或与汉族最近之一民族”。

“仰韶文化与古代外国文化之关系”部分,将仰韶文化彩陶器与意大利西西利岛启龙尼亚、东欧格雷西文、脱里波留(今多译作特里波列)、中亚安诺等地彩陶对比,可能同出一源。尽管提出中国彩陶可能是由西方传入的假想,但指出要“继续研究,方能定论”。

## 《中华远古之文化》的重要意义

该著作的主体是仰韶村遗址发掘(实为第一次,此后1950、1980~1981、2020~2021年又进行了第二、三、四次发掘)的收获和研究成果报告,其发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其重读及查阅相关材料,使我们基本认识到:

第一,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是通过申请得到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安特生带领当时中国最早科研机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5名中国助手与同事袁复礼,以及步达生、师丹斯基两位外籍博士参加的有计划有充分准备的一项系统性科学工作。尽管发掘领导者安特生是瑞典籍学者,但其身份为中国农商部雇员,是当时地质调查所的成员、现中国地质博物馆前身的馆长。师丹斯基等当时也受聘于地质调查所。本次发掘和仰韶文化的发现是中国自己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陈星灿:《中国现代考古学为何从1921年的仰韶村发掘算起》,《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丛书》序言,文物出版社,2021年)。发掘工作实属政府行为,并具有团体考古发掘性质。

第二,发掘动因是为了搞清楚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内涵和文化特征,是中国第一次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正式考古发掘。发掘中在中国将地层学引入考古学,科学性显著。

第三,采用开探沟的方法发掘,这至今仍是考古发掘的主要方法。袁复礼详细测绘了仰韶村一带地形及遗址范围图、局部地貌剖面图等,其精确程度于今仍具有参考价值。发掘中自上而下按顺序编层,记录出土遗物的数量、种类和特征。发掘所用手铲、毛刷、皮尺、卷尺等现在依然是发掘中的必用工具。开创了考古发掘的主要技术和方法。

第四,按石、骨、陶等质地介绍所获器物,将陶器分为粗陶器等两类,挑选标本、描述、绘图、拍照,将典型学运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安特生等人所做系列工作包括考古调查发掘、整理资料、比较分析、编撰报告、论述认识、发表成果,涉及当今田野考古工作和研究的基本全过程。

第五,工作目标明确,即为探索中国史前文化。经过发掘、研究系统提出“仰韶文化”,以及“仰韶文化时代”和“仰韶时代”的概念,确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引入了国际考古学术语,始创运用考古手段从实物资料方面发现、命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整套方法,由首次发现经过研究具有典型特征的小遗址命名考古学文化开始成为惯例。

第六,从1921年10月至12月发掘,考古资料经详细整理研究,1922年元月《中华远古之文化》主体部分成稿并在北京中外学者联谊会(文友会)上由安特生进行演讲,9月完成报告编撰,到1923年1月袁复礼发表考古简报,同年10月正式发表发掘研究报告,开创发掘后尽快整理研究并刊出版考古报告的良好传统。发掘报告的编写理念、论述逻辑、文图照片结合方法、编辑排版方式等都为后来考古报告做出了重要示范。

第七,仰韶文化发掘与研究取得惊人的重大成果给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成为20世纪初叶中国科学界的一项重要成就。开辟了通过出土古代实物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方法、新思路与新的学术类别,对中国现代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建立给予了启发。

第八,注重运用多学科知识认识遗址和遗存,开创以地形地貌的分析解释考古学文化的环境考古学传统;重视人骨、动物骨骼的鉴定和植物痕迹、陶土的分析,开创动植物考古、陶器分析等方面多学科研究的合作传统;考证一些器物的源流与发展,开创以现代民俗学印证史前文化的人类学传统等,是考古学探究中国现代文化来源开山的代表之作。

第九,得到史学界、考古学界的高度评价,如中国考古学早期重要代表人物李济,称仰韶村遗址的发掘,“通过各种专业性和通俗性的报道,发掘成果得到广泛传播”,“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李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李济所谓专业性的报道,应主要指《中华远古之文化》的发表。

第十,除了将仰韶村史前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还最早指出仰韶文化人种当为现代汉族的远祖或与汉族最近之一民族,明确判定仰韶文化的性质为“中华远古之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确立了中国石器时代,实证我国存在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对中国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化史等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据上,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所获资料经详细整理研究,发表了考古发掘研究报告,系统提出、确立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从此揭开考古学探索我国史前文化、中华早期文明的精彩序幕,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严文明、李伯谦、王巍、陈星灿、李新伟等也持这一观点)。此后,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史前考古研究者,出版大量考古报告和论述论文,使得100年后的今天,仰韶文化研究成就卓著、硕果累累。尽管出于材料和时代的局限性,书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描述器物过于简略,提出了错误的中国彩陶西来假说等等,但瑕不掩瑜,其贡献远大于不足。当我们发掘、研究、弘扬仰韶文化,便不能不想起承载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成果、与发掘工作一起具有中国考古学初创标志性重要地位、影响极其深远的考古发掘研究报告——《中华远古之文化》。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文化初造,文明破晓

——读陈洪波《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

郑君雷

陈洪波教授发来《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书稿,嘱我作序。我对新石器考古近乎隔行隔山,万分推脱不得,只好答应写篇读后感。即便如此,仍然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深恐为方家见笑,更辜负洪波教授一番好意。不过,这部著作的基础是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优秀”,评审专家当然是慧眼,读者也有慧心,自然能够读出书中的真知灼见,所以我不必从学术角度置喙太多,可以轻松谈些学习体会,于是略得宽心。

全书共五章,计25万字,插图30幅。第一章作为学术背景概括介绍了西方新考古学的基本观点,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新石器化”和“农业起源”等问题的观点和讨论,以期对于中国特别是岭南地区新石器化研究有所启发。第二章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过程的整体研究,通过对岭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形态特殊性的检讨,以及对西江中游文化区史前经济文化发展阶段及转变的讨论,揭示出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差异,以及产生此种区域特殊性的动因。第三章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现象的个案研究,从酿酒的发生、石器功能和形制的演变、战争迹象等角度,对农业起源、生计方式演变和政治社会结构演进等文化过程进行解读。第四章探讨了岭南与大陆东南亚早期文化的密切交流和整体联系,核心在于分析岭南和中南半岛的“龙山化”现象,强调中国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带对于周边地区的影响。第五章将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进程概括为从“广谱革命”到“稻作农业”,系统总结了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进程的内容、阶段和特点,以及岭南在中国文化早期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新石器化(neolithization)”通常是指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或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转变过程,包括“新石器化产生的原因,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模式,与新石器化相关的农业的起源与传播、陶器的起源与传播、磨制石器的起源,定居的起源以及社会结构复杂化等方面内容。这部著作虽然是围绕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进程展开论述,但字里行间能够见到作者多年来对于考古学理论方法和考古学史的关切,对于岭南作为考古学上“真正的南方”(苏秉琦语)的思考,以及将岭南考古作为东南亚考古有机组成部分的开阔视野。正是由于努力尝试将这些关注和思考融入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中,因此本书的篇章结构、材料组织和论述逻辑都很有特点。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关注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同时也思考气候、环境、资源、区位、族群等背景因素在岭南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长时段、深层次影响,或许正是因为中山大学同样地处岭南的缘故,才会找到我这个“外行”写点什么。

本书以“新石器化”为线索,囊括岭南新石器时代乃至更晚时期的农业起源、生产方式、石器研究、文化交流、酿酒、战争等问题,研究对象多样,内容丰富。全书结构设计别有匠心。第一章理论、方法与学术史的相关概括和梳理,实际是在搭建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研究的理论框架,在此理论框架的指引下,后续研究就顺理成章,也便于切中肯綮。作者在第二章的整体研究中能够抓住关键环节和核心内容,在第三章的个案研究中能够扣紧焦点问题,第四章将视野扩大到大陆东南亚,第五章从宏观

观角度对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过程和模式等问题进行系统阐释和总结,逻辑清晰,重点突出,转承有序,不失为力作。

作者认为,在气候条件较好、自然资源丰富的岭南地区,史前居民采取“富裕狩猎采集”的食物生产模式,在“成熟农业”发生之前即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也由此走上了一条不同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道路;并将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过程划分为“广谱革命—食物生产的萌芽时期”(距今18000年至12000年)、“富裕狩猎采集时期”(距今12000年至7000年)、“稻作农业传入岭南并逐渐与土著文化融合的时期”(距今6000年至5000年)和“成熟稻作农业社会时期”(距今5000年至4000年)四个阶段。作者关于岭南地区在“低水平食物生产”(Low Level Food Production)的物质条件下迈进新石器时代的核心认识,化解了岭南考古学材料中“以磨制石器和陶器出现为新石器时代标志”和“以农业出现为新石器时代标志”的时间冲突,平衡了“岭南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特殊性”与“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整体框架”的关系,并将在距今5000年前后来自长江流域的农业文化打破岭南渔猎采集文化格局的经济形态变革称为岭南地区的“第二次新石器化进程”,从而辨识出岭南地区史前时期独特的新石器化过程和模式,学术意义可谓重要。

作者对于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研究较为深刻、全面,除了熟悉岭南史前考古材料以外,也得益于作者比较熟悉西方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充分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并基本掌握东南亚史前考古的研究动态。本书借鉴了过程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作者对于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缺陷,及其在中国考古学应用中暴露的问题有着清醒认识,正如作者讲到的:“对于新考古学,中国学者学习的重点在视野、思路、技术和方法,对于考古学的阐释理论有自己的看法”,作者是这样总结的,也是这样实践的。这部著作充分发掘田野考古材料的价值,概念简明,行文平实,虽然理论思考比较多,但是与具体材料的结合比较好,特别是把握到“对于岭南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成熟稻作农业这个进化过程进行阶段性划分”这一“认识这个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关键方法”,因此聚焦问题“有的放矢”,解释问题“弹不虚发”。

作为中国和东南亚地理版图和文化版图的重要单元,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过程早就引起学者关注,张光直先生在“华南的‘西南森林地区’——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广西丘陵地带、北部湾沿岸、海南岛和越南的史前文化”的四期划分中曾提出“亚新石器时代”的说法,陈胜前、吕烈丹、刘莉和陈星灿、陈伟驹等先生的研究成果也颇多建树。作者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综合的新阐释,在此领域形成了“逻辑自治”的认识体系。这套认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一些具体观点,肯定会引起学术同行的关注乃至争鸣,我无力在理论层面作更深入评价,只能在阅读中提些建议,不一定正确,仅供作者参考。

苏秉琦先生指出岭南地区是“真正的南方”,岭南地区的新石器化过程也确实有其特殊性。根据作者的认识,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以距今6000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渔猎采集经济和稻作农业经济两大阶段,“前者是更新世晚期以来在本土环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传

# 文物实证“海东盛国”文化

——《渤海国文物研究》简介

彭善国

2002年辽代陶瓷的研究告一段落,我参加了吉林敦化永胜遗址的发掘工作,次年又与王培新教授一起解剖了敦化敦东城的城墙,考察了牡丹江上游所谓渤海“二十四块石”遗迹、西古城、八连城等,对渤海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除了2013~2015年编写吉林前郭塔虎城2000年度考古发掘报告之外,较为系统地搜集了渤海的考古资料,并开展了一些专题研究。《渤海国文物研究》即是这些年来探索的一个结果,也是以文物实证“海东盛国”文化的一个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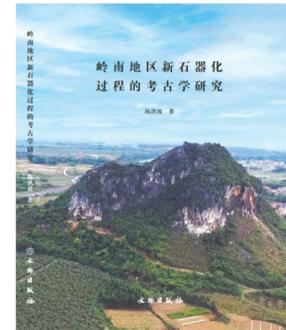
渤海(698—926年)是东北亚地区唐五代时期由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新唐书》记载渤海统治盛期,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有“海东盛国”之称。926年,契丹攻破渤海都城忽汗城,渤海最后一代王大諲纥投降,渤海政权就此灭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改渤海为东丹国,改忽汗城为天福城,以耶律倍为东丹国王,建元甘露。2004年发掘吉林省琿春市八连城城址(渤海东京龙原府故址)时,在一号建筑址殿基发现一片板瓦,其上刻写“继次甘露元(年)五”字。这件文物正是这一重要历史节点的真实反映。928年,契丹诏令耶律之南迁东丹于东平(今辽阳),渤海州县诸民也随之俱迁,渤海城市在南迁过程中大都遭到破坏。自此,东北亚地区存续228年的“海东盛国”的

文化,就只留下残垣废墟供后人探究了。

分布于中国东北、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以及朝鲜半岛东北部的丰富的遗存,是认识与理解渤海物质文化的基础材料,部分弥补了文献史料匮乏的遗憾。考古学揭示,渤海遗址主要有城址、村落址、寺庙址、墓葬以及手工业遗址,出土文物的种类,按材质可大致分为陶瓷器、金属器、玉石器、骨角器等。这些文物,既有渤海自造,反映了渤海自身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工艺技术成就;也有输入域外,体现了渤海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些文物真实再现了渤海社会生产、生活、经济形态以及精神世界,对于探讨渤海文化的构成因素、渤海文化的特性等具有重要意义。

既往关于渤海历史、考古、文化的研究成果,对渤海文物均有一些关注和探讨。专题论文之外,以出版年代为序,重要的论著有《渤海文化》《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渤海遗迹》《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发现为视角》《渤海的历史与文化》《渤海考古》《渤海国史(修订版)》《渤海国历史文化研究》《渤海国社会生活研究》等。随着考古资料日新月异,出土渤海文物的系统的专题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渤海国文物研究》以材质为主线对渤



统,后者则是接受了来自长江流域的一种新的文化传统”,而距今约5000年来岭南地区的第二次全面“新石器化”进程,则“代表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在文化面貌上的进一步统一,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理解无误的话,我想将岭南新石器时代前一个阶段的社会发展形态称为“文化初造”,将后一个阶段称为“文明破晓”,这虽然是两个有根本区别的

社会发展阶段,但也不能截然割裂。学术界已经注意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岭南和东南亚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处于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如陶器出现早;但是中后期表现出滞后性,包括卜工先生指出的“石器的长过程”,尤其是狩猎采集经济始终占重要地位,经济生活长期徘徊在“低水平食物生产”层面,“成熟农业”出现更晚。而在中原地区,距今8000年的裴李岗时代农业已经初步发展,社会分化已见端倪,文明已经起步。与辽河流域、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真正”的新石器时代的

社会发展状态相比,可以用“文化初造”来形容“农业产生之前岭南地区这种似是而非的‘新石器时代’状态”。

距今5000年左右,岭南似乎迎来了一个迈入真正的新石器时代的“过程”,但“即使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自长江流域传入,稻作人群对岭南和东南亚土著狩猎采集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仍然没有改变这一地区的整体文化面貌”。而在中原地区,距今6000年的庙底沟时代已经出现社会明显分化,距今5000多年已经进入中华文明正式形成的古国文明阶段。虽然岭南新石器时代第二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与黄河、淮河、长江等流域仍然存在明显落差,但是随着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和社群交往的扩展,文明因子已经孕育。至距今5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当石峡文化的“石斧已经从实用工具演化为武器和礼仪用具”,当桂南大彩陶“有一部分巨型石斧演变成专用于祭祀以求农业与生育丰产的礼器”,“文明破晓”的晨光已然在岭南升起。

洪波教授提出,“中国史前每个区域的发展都有其特殊性,特殊性才是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精彩之处,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探讨各个区域文化的自身特点”,我深以为然。从文化初造、文明破晓,到“文物彬彬,不异中华”,这部著作揭示的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进程的特殊性、岭南早期文化发展的“海洋性”,岭南地区与大陆东南亚之间早期文化的统一性等现象,对于岭南“自己的青铜文化”“自己的‘夏、商、周’”研究,对于岭南融入“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的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对于岭南延续至明代的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学研究,都有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岭南地区新石器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作者:陈洪波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海文物的系统梳理,意在揭橥文物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涵义。文物的编年序列,融于各类文物的具体讨论之中。若干个案的辨析,订正了既往对于渤海文物年代或性质的一些误判,各类器物的功能,尽量结合文献记载以及出土环境进行了初步复原,以窥渤海社会生产与生活之一斑。本书在对渤海遗存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以出土文物为切入点,对渤海文化的因素构成及其特质进行了讨论。需要说明的是,科技检测是文物研究的重要手段,本书利用了一些检测结果,但渤海文物的科技检测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受客观条件限制,俄罗斯、朝鲜境内的渤海文物的搜集并不全面;对于渤海佛教文物,近年来已有专题研究成果,书中未予讨论。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渤海国文物研究》作者:彭善国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